

地域文化视角与新疆当代汉语文学

张 蕾*

〔摘 要〕 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因独特的个性和审美价值具有研究的价值,然而却因重视不够和最佳视角的遮蔽未能得到准确解释。从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独特性体现着手,揭示出独特性生成的社会环境背景所具有的地域性色彩,在具体研究中,以地域文化和作品的对应关系、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地域文化的历时性及波动性的影响效力、文学对地域文化的反作用、文学未来的走向五个方面,来解析新疆地域文化与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关系,可为观照和评价新疆汉语文学的成就,提供“在整体中”又具有独立性的独特立场和最佳视角。

〔关键词〕 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独特性;地域文化

展望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不难发现对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研究的缺失。其因之一有研究者的不够重视,一些文学史教材特别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新疆当代文学的介绍只限于“少数民族”作家、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创作、个别汉族作家的叙述范围内,缺少对汉语文学的系统介绍和评价,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创作成果就被遮蔽了。另一原因是将新疆当代汉语文学放在中国汉语文学中,只看到了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对主流文学的回应,却忽略了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独特性,而淡化这种独特性就是未能找到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最佳视角,来说明这种独特性的成因、表现和发展。

长期以来都是把新疆当代汉语文学放在西部文学的范围中,新疆虽然处于祖国西部,但是从文化角度来看,把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囊括在西部文学的评论当中,不能反映其真实全面的特征。西部文学是“受到党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建设新疆、我国现代化建设重点逐步西移这一战略部署的感召,且受到作家的地域文化意识、文学审美意识觉醒的推动,创造西部电影、西部音乐、西部文学,一时成为文坛的热门话题”^①。西部大开发的西部是经济欠发达,有待进一步开发的地区,更多层面上指代的是政治和经济含义,并非社会思潮一致、创作风格相似的地缘性文学区域。而且“西部文学”

*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210097。

①陈栢中:《我与“中国西部文学”》,《西部(新文学)》2013年第9期。

这一提法本身也具有模糊性和质疑点,理论家林默涵认为倡导者是从外国引进了“西部文学”这个名称,“规定几条特征”,要作家艺术家根据他们设想的所谓“本质特征”来进行创造,制造作品,这岂不是从概念出发的创作方法吗?^① 提法的不定性导致我们对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认识是片面的、零散的、不够准确的。西部文学倡导的开发西部和寻根民族精神的主题,在新疆当代汉语文学作品中并没有全部表现,开发路程和拓垦斗志有所涉及,但民族精神的发掘和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发展是不匹配的,大量移民入疆的汉族创作者及贫瘠的传统文化注定其目光只能转移到少数民族的文化中,却又由于语言的屏障,民族文化资源得不到有效发掘,新疆当代汉语文学从这些方面是有异于西部文学的。

回到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的建国后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多是反映革命历史、民族团结、屯垦事业方面的内容,受五十年代中期“双百”方针、六十年代极“左”思潮的影响,新疆汉语文学创作题材狭窄、内容模式化、思想肤浅,到了“文革”十年,大批作家受迫害,创作空间遭到挤压,文坛一片凋零。虽然汉语文学发展缓慢,但与内地主流文学保持一致,关系更加密切,创作队伍也日益壮大,为下一阶段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汉语文学创作群体在这时基本形成,具体有两种指向,其一是母语为汉语的汉语文学创作,这里指的是新疆的汉族作家创作;其二是第二语言为汉语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同时这些作家是世居新疆、出生或成长于新疆、曾经居留新疆若干年后又离开新疆,他们创作的作品是新疆背景或是新疆题材,简单地将他们概括为土著作家、移民作家、客居作家、流寓作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语言的障碍和翻译的零散,其他兄弟民族语言的文学作品在这里未做涉及。部分具备汉语创作能力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所以在这里把研究的范围界定在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创作。

相对复杂的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创作者群体就已显得与众不同,它既有别于内地的汉语文学,也不同于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汉语文学,在作家文学创作背后隐藏着迥异的文化意识,特别是移民后汉族作家对新疆的情感变化,双语作家对本民族文化的重新审视,当中交织着民族与民族、异质文化、宗教习俗、价值认同等方面的复杂矛盾。这样特殊的现象在内地汉语文学中几乎不存在,内地汉语文学多是区域的差异和城乡的不同,基本上没有强烈的文化碰撞和大规模移民生活经历的同时进行。即使是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语文学相比,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创作的独特性也是赫然显现的,西藏海拔高空气稀薄,生活环境欠佳,汉族迁徙人口非常少;内蒙古、宁夏、广西本身就一直存在汉族,地理位置没有新疆特殊,历史中并没有不断的移民进驻,民族成分和宗教信仰也不如新疆复杂,汉族创作者的文化身份相对简单一些。

进入新时期,随着全国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文学浪潮也是此起彼伏,新疆当代汉语文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外在条件的推力加上独特的创作群体,汉语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文学的独特个性愈加凸显,标志是八十年代的“新边塞诗”、九十年代的新疆散文、二十一世纪的屯垦小说、流寓小说、双语创作等,突破了同时期中国主流文学的平均线,达到一个较高水平,评论界纷纷对这些文学现象发表论文肯定其价值,文学史著作也相继推出,处于繁荣期的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独特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新时期的“伤痕”、“反思”、“改革”文学大潮中能看到新疆的身影,艾青、王蒙、杨牧、朱定、文乐然等流寓作家新疆经验的书写,是心灵史式的随想录、流放者的内心成长史,丰富了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既有他们对新疆多元文化感同身受的描述,也包含着他们对人性深刻的呐喊和反思、对历史荒诞的批判。新疆经历也成为他们这一代人的特殊旅程,激发了这批新时期“归来

^①陈栢中:《我与“中国西部文学”》,《西部(新文学)》2013年第9期。

者”的创作,开启了生命人性的思考模式,新疆经验的文学创作在历史层面上具有某种特殊的内涵。另一种军旅文学充满了昂扬的革命政治情怀、凝重的历史沧桑感、神奇的英雄主义色彩,解放军进驻新疆或战斗在军垦第一线,或留守部队,或成为地方干部,和平年代这些老兵难忘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多采用回忆录的形式来纪念,现实感很强。战斗军垦第一线老兵成为后来的兵团人,在此基础上的“屯垦文学”构成了“绿洲作家群”,体现出绿洲亚文化下的“地窝子”创业精神,及兵团儿女的生活情况,如董立勃的“下野地系列小说”、章德益大漠绿洲的奇思妙想、赵天益底层生活的关注,同时更有一种崇高感的审美形态,这是对我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创造,一个独特的美学贡献。

新疆的新边塞诗继承古代边塞诗的雄浑之风,响应时代的感召,为中国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刚健、悲壮豪迈之气,开了一代诗风。谢冕、顾骧、周政保、余开伟、孙克恒一致认为:“新边塞不仅是属于中国西部的,它也是属于全民族的。它不仅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竖起大旗,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文学中可为翘楚。边塞诗体现着我们正在腾飞起的中华民族之魂,使我们看到一个进取民族的伟大形象。”^①体现了新疆当代汉族诗歌的最高成就,也为全国诗歌增添了一种别样的诗歌书写。九十年代周涛散文就是用一种“边陲”的“永恒”和“美”对抗大一统内地或沿海地区的世俗观念^②。刘亮程则用他出神入化的笔,把他的“村庄”加以艺术塑造,创作出“村庄”系列散文,放到中心文化主流文化面前,令读者为之震惊^③。韩子勇甚至评价新疆九十年代是“散文自治区”,在当时全国散文通俗化、商业化的环境中,新疆充满哲理思辨的精神散文的确有震撼人心的效果,和同样成果丰硕的西部散文不同之处也正在于多是哲理性思考的智慧和人性共通的内心感悟。到了二十一世纪,新疆诗歌散文虽不再处于巅峰位置,却以诗和文兼具的散文诗的形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继续繁荣着新疆汉语文学。

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另一创作主体,少数民族的双语创作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也称之为“跨文化写作”或“边界写作”,以旺盛的创作力展示其价值。新疆著名评论家陈柏中评论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双语创作几乎是当代世界性的文学现象……阿拉提·阿斯木是其中成绩显著的一位,在用两种语言进行交错思维和表达的过程,路途所体验到的奥妙和乐趣,是我无法洞察和言传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能在两种或多种语言文化的参照中来观察生活,选择视角,在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中发现人类共通的美质和缺憾,从而既根植于地域的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又能进行跨文化的人类生活境遇和发展前景的宏观思考,这无疑给作家带来了开阔的视野和深邃的探究,带来了风格上的独特变化。不少用双语创作的世界性大作家的经验都说明这一点。”^④据统计,现在新疆文坛的双语作家已近百人,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数量,他们当中哈萨克族作家阿克拜尔·米吉提、叶尔克西·胡尔曼,锡伯族作家傅查新昌的作品甚至被翻译成外文,走向海外。在一个少数民族居多的地区,且双语教育也没有完全普及的情况下,能有如此规模的人数跨越语言的瓶颈来从事汉语创作,已经是一个特殊的现象了,况且这种情况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并不明显。双语作家拥有跨文化视角的身份,突破了固有的汉语文学由汉族创作的模式,以他们独特的民族文化背景为依托,丰富了新疆当代汉语文学,使其具有显著的地域性文化内容。

在具体创作方面,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多采用民族文化资源,巧妙借用民族民间故事、人物原型、构思模式、宗教和新疆土语,体现出高原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伊斯兰文化、中原文化、现代城市的工业文化、市场文化、兵团亚文化的相互碰撞和交织,呈现了多元文化的异彩纷呈,这在其他地区是

①顾骧:《开一代诗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②沈义贞:《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演变史》,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64页。

③范培松:《中国西部散文史·下》,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94页。

④冯冠军:《坚守与超越——新疆少数民族双语作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新疆大学,2006年。

没有的。除此,汉语文学也有很浓烈的史诗性,特别是在双语作家的作品中,以民族史诗的长篇小说来反思历史文化;而汉族作家则是用新疆古代历史,书写了地域性的西域历史小说。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独特性是依据地域环境孕育出来的,在与全国或其他地区的对比中更为凸显。当然不单单局限在上述几个方面,只是这些比较突出,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重要的影响,具备研究的价值。

二

指出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独特性是我们首先要说明的,那么接下来会有一些问题接踵而至,如何独特?独特性是不是具有价值?为什么独特?一连串问题的解答需要借助一个合适的最佳角度来阐述,才能揭示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独特的价值。回答“如何独特”是要说明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独特性是怎么产生的,即独特性的发生,考察的是结果产生的过程,带有很强的时间性。力图探索独特性的发生,就得跟随孕育这种独特性文学的地域文化变迁,根据不同阶段地域文化的稳定性成分和波动性因子,来分析对汉语文学直接的影响。如果说解释独特性的发生是在新疆特殊的地域文化环境背景中,那么独特性具有的价值则需要在全国文学中去考量,通过和全国相似类型、主题、地区、作家的比较,发现新疆作家作品的独特魅力及对全国文学的影响。由此可知,文学的独特性离不开孕育它的社会环境,“由于某种精神、气候的作用,我们才看到某些时代某些国家的艺术宗派,忽而发展理想的精神,忽而发展写实的精神,有时以素描为主,有时以色彩为主。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企图向别的方面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①。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独特性的原因,或者说是彰显作家创作个性的作品都是在新疆特殊的社会时代环境背景中产生的。

创作主体复杂的文化身份的解释,要追溯到新疆的历史沿革和人口迁徙。新疆古称西域,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起构成新疆最古老的民族,从汉代到清代朝廷一直都有内地移民。建国后开启了大量移民入疆模式,由于开发的需要,先是17万人民解放军官兵集体转业为生产建设兵团,成为中国最大的兼具戍边屯垦、实行“军、政、企合一”的特殊行政区划单位,也是中国现存的最后一个生产建设兵团。后有大量的支边、随迁人员、“黑五类”劳改人员、逃荒、季节性民工等五湖四海的内地人员来疆,分布于新疆的地方和兵团,与这里的少数民族融合,共同构成新疆的人口地图。从迁移时间的早晚、地域的分离、以及行政组织的分割来看,汉族在新疆有兵团汉族与地方汉族、老新疆人与新新疆人之分。因此,创作主体的土著作家主要为双语作家,他们的文化之根在新疆;移民作家有地方汉族和兵团汉族作家之分;客居作家大多是文化名人名士,在新疆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又离开,新疆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一段记忆;流寓作家是流放边疆、好奇西域异域风情或是迫于生计来疆,分布于南北疆各地。可以看出,国家对新疆的政策和新疆自身发展的需要决定了新疆人口的构成,地域性的社会环境直接影响作家的分类,这些能够解释他们背后复杂的文化意识,复杂的文化背景造成的他们取材选角、创作思想、审美、构思方式的差异,同一疆土的汉族作家的区别,双语作家与其他少数民族作家的异处,汉族作家与少数民族作家的不同。

艾青、王蒙、杨牧、文乐然等一批流放者没有放弃文学创作,新时期成为“归来者”,用自身的新疆经历紧随当时的文学思潮,体现了“流放者”深刻的人性反思和生命意识。这归因于他们的新疆生活经验,文革期间他们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带着失望和痛苦来到新疆,然而正是新疆多民族包容乐观的心态、

^①[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35页。

开垦边疆的奋斗精神鼓舞了他们,赶走了人生的阴霾,重获一个人生活的基本权利,也使他们对人生、自然、死亡有了更多的思考。正如王蒙自己所说:“即使在那个不幸的年代,我们的边陲,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各族人民竟蕴含着那样多的善良、正义感、智慧、才干和勇气,每个人心里竟燃起那样炽热的火焰……即使在我们的生活变得沉重的年月,生活仍然是那样强大、丰富、充满希望和勃勃生气。”^①军旅文学的历史感和屯垦文学的悲壮感有相似的背景,他们都源于入驻新疆的解放军,只是屯垦文学创作群体中除了解放军,又有后来支边、知青、下放、流亡等形式的移民。不过它们所产生的独特的审美形态,都离不开建国初期解放军亦军亦民生产劳动的屯垦经历,面对时而大雪风暴的侵袭,时而干涸炎热的酷暑,广袤苍凉的大地连同充满顽强生命力的动植物,激发了屯垦战士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建设新疆的革命情怀和拼搏精神使兵团儿女拒绝命运的安排,历经磨难追求幸福具有有深深的崇高感。

新疆有大漠、山川、雪峰、绿洲、河流等自然景观,是混血的地域也是中亚文明的汇聚地,悠久的人文历史和浓郁的民族风情为文学发展创造了诸多表达形式的可能,自古以来就是诗歌散文的沃土,诗歌散文创作在新疆都有很深的地域文化渊源。这片广袤开阔、神秘美丽的疆土产生了东方三大著名英雄史诗中的两部,即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蒙古族的《江格尔》,其他民族如维吾尔族的诗体文学名著《福乐智慧》、哈萨克族的民间叙事长诗《萨里哈与萨曼》等流传于世,作家可以直接从这些史诗中掘取创作资源,表现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涵。汉族诗歌从唐朝的李白和岑参,中经元代的耶律楚材、贯云石,到清代的洪亮吉、林则徐、纪晓岚等为代表的源远流长的边塞诗,给新边塞诗带来了诸多启示和借鉴的可能;而散文方面早在《史记》、两《汉书》中,《西域传》就记载了新疆丰富多彩的历史和风土人物,游记散文《大唐西域记》和《长春真人西游记》,为西域历史小说提供了故事的原型;到了三四十年代以茅盾为代表的内地汉族文化名人相继来到新疆,留下了珍贵的散文佳作;建国以来,内地知名作家刘白羽、王蒙、汪曾祺、贾平凹、张贤亮、张承志、毕淑敏等,纷纷西出阳关来新疆采风,写下了描绘新疆的美文,激发了新疆本土作家散文创作的潜力。而散文充满哲理思辨的特点,也和新疆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恶劣有关,面对空旷匮乏的自然环境,人们常有孤独感和无助感,容易进入内心去思考周边事物;另有新疆经济欠发达,生活节奏缓慢,使作家有闲情逸致思索生命的价值和自然的规律。因此,新疆诗歌散文取得的辉煌成果,不能不说是时代积淀的地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迸发出来的。

至于汉语文学中体现的多元文化、民族语言的交杂使用、民间文化资源的利用、西域历史,以及双语作家的创作等独具特色的内容,离不开新疆特殊的社会环境,季羡林先生回答了产生这种环境的原因:“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了许多文化体系。依我的看法,共有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穆斯林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体系。四者又可合为两个更大的文化体系:前三者合称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可称西方文化体系。而这些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世界上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新疆。”^②可见这种独特的社会环境是独属于这个地域发展的结果,它作用于文学,显示明显的地域性,而所有这些又往往是其他区域不突出的,所以用地域文化这一独特的视角是最合适的,能有效揭示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独特性的价值。

三

以往对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研究多是就单个作家、单部作品的横向研究,或是某个突出的文学

^①王蒙:《在伊犁·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74页。

^②季羡林:《新疆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现象分析,几乎没有对此的整体纵向研究,中国文学史中没有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专门著述,提到这里的汉语文学,通常是放在中国文学的范围内,不被看成是区域性的文学,而是以多民族文学来指代新疆区域性的文学。新疆文学史对汉语文学的研究也是包含在新疆多民族文学史中,由于新疆是一个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一般理解的区域性文学指的就是新疆多民族文学,汉语文学是其中的一个语种,忽略了汉语文学产生的不同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背景。“其实对于新疆文学界来说,中国文学传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汉族文学传统(其中包括新疆部分的汉族文学传统),一是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传统(其中包括新疆各少数民族的不同的文学传统)——这些都是新疆的汉族文学赖以生存与不断开拓的伟大土壤;离开了这块土壤,也就失去了自己,失去了自己的独特性与存在的位置,也等于失去了所谓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可能性及未来自然存在着的机会。”^①而且文学史对此都以全国或新疆相同的创作背景来讨论作品的艺术特色,对作家也只是简历似的介绍,汉语文学本身存在的传统及作家文化身份等特殊问题被忽略了。这样,即使作品呈现了多么令人新鲜的差异性,接受者可能感受到的仅是用语言构造的表面化世界,文本隐藏的深层次内容包括作家价值观、写作背景、思想感情等艺术价值被遮蔽了,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独特性就被隐藏了,催生它的地域性的社会环境背景没能被指出,与此同时独特的地域文化观照视角也被遮蔽了。

即使是民族、历史、生态、宗教等角度来看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它们或者是关乎制度精神文化层面的内容,或者是关乎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特点,和谈的《新疆当代多民族生态文学的多元共生与融合》、郑亮和王聪聪的《多元文化背景下新疆新时期生态文学研究》课题及相关学术论文都注意到了新疆当代文学的生态元素,如披露出不合理的流域规划、开源节流、工业污染,再加上降水量严重不足,水资源质量恶化等问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新疆的生态问题在全国其他区域比比皆是,甚至已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文学作品中大量涌现的生态问题是现在共有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全国很多地区甚至是全球都面临着环境恶化的问题,这并不能反映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独特性。

民族文化视域更多的是通过民族文化关系的比较,艾光辉的课题《新疆当代文学与多民族文化关系研究》和张春梅的课题《民族文化视野中的城与乡》,充分肯定了多民族文化对新疆当代汉语文学作品的影响,指出作家创作会不自觉地受多民族文化习俗、语言思维等潜移默化的作用。的确,新疆有47个多民族聚居,民族文化资源非常丰富,而内蒙古现居49个民族,宁夏有31个民族,云南有52个民族,多民族聚居的比例不少于新疆,且与新疆一样实现了各民族的融合,彼此的文化相互渗透。用民族文化视域观照新疆当代汉语文学,洞察到的也只是单纯的民族文化的辐射力,并没有涉及到当地的历史沿革、社会变迁、人口构成、经济发展等地域文化内容,汉语文学的独特性也不能有效地展现。

总的来看,这些观点都属于地域文化的内容,是其客观和主观的产物,它们与方言文化、饮食文化、民间信仰、民间建筑、移民概况、自然环境、民风民俗等构成新疆稳定的地域性文化,不具有全面性,揭示出的只是文学现象,就像“展览一碗汤并不能传达出任何生产它的工人的生活情况,也不能传达出任何消费者生活的情况”,而“艺术的真理正是在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中”^②,汉语文学的独特性也就被掩盖了。而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价值是在文学作品的特性和孕育它的地域文化中,随时间长河的流淌,人文历史、文化变迁、民俗风物、自然地理、风土人情等愈显多元和丰富,赋予文学的言说也是独具个性。所以用地域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特别是从地域文化的动态发展变化来看对文学的影响,能显示新疆文化与文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能清晰解释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对

^①欧阳可惺、钟敏:《区域文学的律动〈天山〉流变与新疆当代文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0页。

^②[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242页。

中国当代文学依附地位的摒弃,具有全面性和整体性。

四

新疆当代汉语文学极具个性化的艺术魅力,是有很浓的地方色彩的体现,用地域文化视角研究汉语文学应该是最妥当的。用地域文化这一角度来研究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归根在文学上,具体研究只是通过地域文化的介绍和比照,来揭示汉语文学中的一些问题,而不是泛谈“文化”。这就意味着和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相关的地域文化内容才能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文化赋予文学的意义,又需要文学来作承载。但文学绝不是百纳箱,任什么文化现象都可以往里装,文学的承载力毕竟是有限的。”^①因此,与文学相关的,研究中涉及较多;与文学无关的,在这里不得不舍弃。那么,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也就是如何用地域文化视角研究新疆当代汉语文学,主要从五个方面入手:一是寻找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独特性体现的地域文化内容,指出它们的对应关系;二是剖析地域文化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或是形成了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创作者的思维方式、处理题材的方法、观察问题的角度及审美情趣的偏好等;三是从地域文化的历时性及波动性来看对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影响效力,研究它对汉语文学产生的积极意义和制约瓶颈;四是研究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对地域文化的反作用,包括对地方性的塑造、文化地理空间的形成、地域文化的留存等;五是通过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双向作用,指出新疆当代汉语文学未来的走向。

由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独特性是在蕴育它的新疆地域文化中产生的可知,其独特性主要依托于地理地貌、自然景观、宗教习俗、语言乡音、多元文化的民风、历史性的民族风情等地方色彩的内容。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具有很强的地域文化实指和表现,想要说清楚它具体的指向和表现,就必须得回到作品,证明地域文化在汉语文学中的体现。当然并不是找寻作品中所有的新疆地域文化,而是应该选择和作品相关的,文学的独特性要求地域文化是能给其增添特殊辨别力的文化。如果全部涉及,将会失去了文学研究的目的,就机械地成为了地域文化筛选。那么,甄选时理应选取那些相对稳定,在作品中大量出现且具有很强辨识度的地域特征文化。一般而言,具有地域特征的文化并不难分辨,它主要有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还有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它们是保留得较为长久的地域文化。所以,我们要在此基础上寻找和作品相关的地域文化内容,征引相关的新疆地域文化资料,进一步挖掘文学中地域文化内容的具体含义。

通晓了文学中地域文化指向及表现的意蕴,基本完成了对作品内容的解析,但只是研究地域文化与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关系的一部分。因为决定作品及其呈现方式的是作家,作家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并直接作用于作品,可见地域文化与作家千丝万缕的关系是文学作品中地域文化的根源。同样是汉语创作,全国各地区的汉语创作截然不同,我们以和新疆汉语文学关联最大的西部汉语文学为例,仅在西部汉语文学中,就能看出每个地区作家创作风格的差异,如题材相同的乡土散文,都是对西部村庄人事物的描写,刘亮程谱写的是乡村哲学,柏原却是温情地日常生活描写,这恐怕和作家自身与地域文化的特殊关系有关。刘亮程所处的新疆地域辽阔,人口分散居住,孤单寂寞再加上恶劣的自然环境,人们表现出坚强的忍耐力,会更多地思考生命的意义;柏原多是对烟囱、土场、麦子垛、炕、小河的追忆,虽苦但充满日常生活的情感。不仅如此,就是一样的新疆题材文学作品,外来者的眼光和本土作家的感知也是有着质的区别,外来访问或游玩的人创作的作品,尽管物象化的描述精彩动人,

^①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但不能深入到本地文化的精神层面。而本地作家驾驭作品时,是一种“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的割不断的情谊,驱使他们把地域文化融汇于作品中。换言之就是作家文化身份和文化渊源的差异,导致他们对地域文化的接受出现不一致。由于新疆汉语文学创作队伍类别特殊,为了便于论述我们把按民族语种分类的汉族作家和双语作家,分成了土著作家、移民作家、流寓作家、客居作家,以便理清作家背后的文化身份。把新疆地域文化和作家联系起来,作家背后复杂模糊的文化身份就能得以界定。我们要重视作家自身所携带的祖籍文化因子,也要注意到新疆的多元文化、多民族、多宗教、异质风俗习惯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或者说是作家文化心理结构再构的变化轨迹。当然,这些问题的解答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作品上,寻找作品中明显的和隐含的因素,作家受地域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特异的观照角度、题材选择、审美追求、价值取向。

地域文化对作品、作家的影响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显示出不同的特征,并非一成不变,这是由事物都是处在运动变化中的规律所决定的,地域文化也在运动变化着。因此,要注重从地域文化的时期性和波动性考察其对汉语文学的影响效力,研究其中的动态变化过程,更好地发掘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独特价值的产生轨迹。文学政策的制定、行政政策的调控、民族政策的实施、文明形态的渗透、经济发展的制约、教育水平的高低造成了地域文化不同阶段的差异,相应地对新疆当代汉语文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叙述形态、历史理念、审美价值、思想价值等有独特价值的积极意义,也包括强大的地域性对文学的局限影响。同时也要考量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在全国文学中所处的位置,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以时间为坐标轴,把变化过程分为三个时间段,第一阶段 1949 年—1966 年,第二阶段 1967 年—1977 年,第三阶段 1978—至今,通过分析每一阶段文学政策、行政政策、民族政策、文明形态、经济发展、教育水平等地域文化的波动,看出各阶段发展的不平衡性,再由这些理出每一时段汉语文学独具特色的方面,并把它放在全国文学的大背景中去衡量,与其他地区相同时段同类文学进行比较,具体解析独特性所包含的创作动机、艺术思维、审美情趣、历史意识、民族情感、生命关怀等的价值,对新疆文学和全国文学产生的影响。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看到地域文化对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制约作用,作家在承受了地域文化的恩泽时,也因过度依恋地域文化而带来创作瓶颈。过分偏爱地域文化题材,则会遗漏现代文化的进步性,不能很好地与世界对话;也会因视线的狭窄,压制文学的个性和创造力,最终变为地域文化的传声筒。

一般用地域文化研究文学,主要集中在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很少谈及文学对地域文化的反向作用,其实“文学的想象与叙事广泛而有效地参与了‘地方感’的编码与建构,参与了地理空间的生产”^①。地域也是文学的成品。赖特和洛温塔尔就曾指出:“大地的表面是人的作品,它折射着文化风俗与个人想象。地理知识不仅仅是地理学家的,而且应该是包括诗人、小说家、画家、农民、渔夫等形形色色的人们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或真实或虚构的知识。”^②鲁迅的绍兴、老舍的北京胡同、沈从文的湘西、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陆文夫的苏州小巷、马尔克斯的马孔多、梭罗的瓦尔登湖……正是通过作者笔下生动富有感情的描绘,使之成为了文学地图和文化地理学中的标志性地域。试想如果没有文学作品中大量的地域性地名的实指,这些地方就不会具有特别的文化含义;或者浅层次的理解为文学作品有效地宣传了地域。如此看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对地域文化的反作用,我们可以从较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入手,尤其针对那些多次重复出现的地名及文化景观,考察它的接受情况,说明文学对地理空间的塑造意义。当然有一个前提是,这些地名和文化景观之前并不为本地人之外的其他人所熟知,否则,便失去了我们研究的意义。甚至,我们还要考虑到文学作品

^①南帆、刘小新、练暑生:《文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77 页。

^②R. J. 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唐晓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218 页。

能够长久有效地保存地域文化,当今世界面临着全球化、一体化趋势,千年传承的文化精髓受到威胁,同质性对地域性的侵吞现象愈加严重,曾经显现的地域文化现今未必存在,而富有地方色彩的文学作品很好地保留了地域文化的丰富内容。当然,这就需要找出文学如何保存了地域文化,指出被保存的地域文化当今流失的现状。

新疆地域文化与新疆当代汉语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间有着双向的作用力,在平衡二者的关系时需保持客观全局的观念,避免因狭隘的地方意识阻碍文学发展的步伐,也不因过分倾斜其他文化丢失地域文化精髓。面对新疆丰富的地域性文化,本土诗人沈苇强调“从地域出发的诗,恰恰是从心灵和困境出发的。语言是唯一的现实和可能的未来。回到一种常识:诗人不是用地域来划分的,而是用时间来甄别的。地域性写作既是地域的,更是人性的。地域性当然重要,因为人性的一半由地域性造就”^①。对于未来的发展道路,新疆当代汉语文学首先要立足本土优秀的文化资源,充分利用民族史诗的智慧结晶,找到地域性乃至人性共通的层面;努力深入多民族文化的本质,摒弃浮光掠影式的描写,多加表现民族文化心理和宗教理念。同时,根据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要求新求异,用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吸收先进的现代文化,补足自身欠缺的地方;对待现代化的都市文明,文学也不应一味的冷落或遗弃,把关注对象仅局限在乡村,应着力表现新疆市民的都市文化生活,充实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创作题材。

用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主要是依据新疆当代汉语文学产生的社会环境背景体现出来的地域性而定的,不失为一种最佳观照方式,能合理、清晰地说明和汉语文学的关系,有效地揭示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独特魅力。

(责任编辑:陆 林)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Xinjiang and Its Regional Cultural Perspective

ZHANG Lei

Abstract: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Xinjiang is worthy of study in that it is unique in aesthetics. However, it fails to be adequately understood because the studies on it are insufficient and the best perspective on it remains unavailable.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this variety of regional literature lies in focusing on its uniqueness and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 context where its uniqueness is form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Xinjiang and its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can be investigated in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the match between the works and the regional culture; the influence on the writers exerted by the regional culture; the effect produced by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the effect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Through putting the uniqueness and regional position into the whole picture of literature, the approach mentioned above can make the best perspective on the achievements made by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n Xinjiang.

Key words: Xinjia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uniqueness; regional culture

^①沈苇:《地域性碎语》,《名作欣赏(鉴赏版)》2013年第9期。